

绪论 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一 历史与空间

1. 历史的地理基础

人类社会存在于地球表面这一基本事实，决定了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基础地位。毫无疑问，历史的发展变化都是在具体的地理环境中进行的，每一历史事件都发生在一定的地点。大多数的学者认为，如果将人类历史看做一出戏的话，地理环境就是演出的舞台。但事实不尽如此，地理环境常常并不甘于仅仅充当舞台，而是不时地参与演出，成为演员，甚至设计或改变剧情的发展。所以在很多时候，地理既是历史这出戏的编剧，又是导演和演员，还是剧情的组成部分。正因为此，19世纪的法国历史学家朱尔斯·米什莱(Jules Michelet)认为，历史就是地理本身：

没有地理基础，创造历史的人，就像有些山水画中的人物，好像在半空中走路。地方不能只视为演戏的舞台，地理在各方面影响历史，例如气候、粮食等。人们与国土，就像鸟与鸟巢的关系。^①

由于他的影响，法国历史学者，习惯上都在著作中先介绍地理，例如 E. 拉维斯 (E. Lavisse) 主编的《法国通史》(Histoire de France)，第 1 卷便是由维达尔·德·拉·白兰士 (Vidal de la Blache) 撰写的《法国地理》(Tableau de la Géographie de la France)。而法国年鉴学派 (Annals School) 史学的思想方法更是深受所谓“维达尔传统” (Vidalian Tradition) 的影响。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 (Lucien Febver) 十分重视地理环境对人文氛围的影响。在《土地与人类的演变：历史学的地理学阐释》(La Terre et l'évolution: introduction géographique à l'histoire) 中对地理决定论的观点加以抨击，用“或然论”的观点，分析人类发展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他的博士论文《菲利普二世与法朗什——孔泰地区：政治、宗教和社会史研究》(Philippe II et la Franche-Comte) 是法国地方史研究的楷模，其特点是把一个省的地理因素融合到前工业化时代的社会演变中去^②。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 在其代表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的第一部分，首先生动具体地描述地中海地区的山脉、平原、海岸、岛屿、气候、城市与交通等地理环境方面的情况，其主题是说明地理与历

^① 见 Jules Michelet, *Histoire de France*, 1869 年版的序言，转引自 H.C. 达比：《论地理与历史的关系》(姜道章译)，《历史地理》第 13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② 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第 13 章“法国年鉴学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05—506 页。

史、空间与时间的辩证关系，他声称自己所要论述的是“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这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①。在“第一版序言”中，布罗代尔把历史时间区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分别表示三种层次不同的历史运动。后来，他更明确地把这三种时间称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并提出与这三种时段相适应的概念：结构、局势和事件。所谓“结构”，是指长期不变或者变化缓慢的，但在历史上起经常、深刻作用的一些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局势”是指在较短时期内起伏兴衰、形成周期和节奏的一些对历史起重要作用的现象，如人口消长、物价升降、生产增减、工资变化等等；所谓“事件”则是指一些突发的事变，如革命、条约、地震等。其中，起长期、决定性作用的是自然、经济、社会的结构。这样，布罗代尔实际上就把地理环境放到了决定历史发展之基本构架与方向的重要因素的地位，并将地理分析贯彻到对具体历史问题的认识中^②。他晚年撰写的《法兰西的特性》（*L'identité de la France*）之第一部即以“空间和历史”（*Espace et Histoire*）为名，显示出他全面探讨地理环境与人类历史关系的努力，而其思想的根基则毫无疑问是或然论的。他认为法兰西的特性只能从长时段的深层历史中去寻找，诸如地理、人口、经济生活、国家、文化等变化缓慢的结构，对这个特性的逐步形成起根本性的作用。他强调自己“力图解释的乃是法国的历史与领土之间多种多样、错综复杂、难以把握的关系；领土容纳

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唐家龙、曾培耿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第 8 页。

张芝联：《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见布罗代尔：《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译本第 1 卷（顾良、施康强译）前之“中译本代序”，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1~18 页；前揭《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第 518~520 页。

着和承载着历史，并且以一定的方式解释历史，尽管还远不能对历史作出完美的解释”^①。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在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下，许多学者完全或部分地采用地理的观点解释历史现象。乔治·A. 史密斯（George A. Smith）的《圣地的历史地理》（*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Holy Land*）试图“从地理的状况去了解，为什么历史事件的发生，会有不同的方向”^②。爱伦·C. 森普尔（Ellen C. Semple）于1903年出版的《美国历史与其地理环境》（*American History and Its Geographic Conditions*）从地理的观点，解释美国历史的各个不同时期。在她的另一部巨著《地理环境的影响》（*Influences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中，她用文学化的笔调写道：

人是地球表面的产物。这不仅意味着人是地球的孩子，十分渺小，并且也意味着，地球哺育了他，养活了他，给予他工作，引导他的思想，让他经受苦难，以便强壮其身体，敏锐其智慧，让他去面对航海或灌溉等问题，同时又暗示解决的办法——在高山上，它给人以铁打的腿肌去攀登陡坡；在海岸边，它给人留下了弱软的腿，但却给人以发达、有力的胸膛和手臂去掌握舵桨；在河谷中，它让他接触肥沃的土壤，但单调、平静而按时作息的生活限制了他的思想和雄心，农庄的狭小天地封闭了他的胸襟；在风尘飞扬的高原上，在一望无际的草原和干燥的荒漠中，人们放牧牛羊，逐水草而居，生

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顾良、张泽乾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5页。关于布罗代尔所受维达尔地理学思想的影响，另请参阅池永歆：《维达尔地理学影响下的布劳岱论著》，（台湾）《思与言》第35卷第4期，1997年12月。

^② 前揭 H.C. 达比：《论地理与历史的关系》。

活虽然艰苦，却避免了起居单调的折磨，与牛羊为伴时，可以闲情逸致地思索，而天地广阔，生活多样，他的思想博大而单纯；宗教是一神教，上帝只有一个，就像一片无垠的荒沙、草地一样的独一无二。他反复咀嚼他的单一信仰，作为一种空虚心灵上的食粮，他崇拜偶像；在不断定期游牧生活中所形成的广大空间思想，使他远离乡土，在广泛的征服中获得合法的果实。^①

这样的思想方法，是 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期学术界的代表。对于中国学者来说，E. 亨丁顿（E. Huntington）的《亚洲的脉动》（*The Pulse of Asia*）和《文明与气候》（*Civilization and Climate*）曾经带来巨大的冲击。这些著作中的观点显然不尽正确，有些谬误在今天看来更是显而易见的，但它却启示我们：在考察历史发展规律与分析具体历史现象时，地理的观点与方法是不可缺少的。

地理环境及其变化，与中国文明起源、中国历史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已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陆巍、邓辉等关于旧、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特点的考察^②，张丕远、王铮等关于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的分析^③，以及侯仁之先生所领导的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关于西北干旱与沙漠地

普雷斯頓·詹姆斯、杰弗雷·马丁：《地理学思想史》（李旭旦译），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第 357 页。

陆巍等：《试论第四纪晚期中国古人类三次迁移与气候变化》，《地理学报》1997 年第 5 期；邓辉：《全新世大暖期燕北地区人地关系的演变》，《地理学报》1997 年第 1 期，等等。

王铮、张丕远、周清波：《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兼论人地关系》，《地理学报》1996 年第 4 期；王铮等：《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资源与经济的影响》，北京，中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交论文，1994 年；史念海：《论我国人口重心区域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 年第 2 期；陈中原、王张华：《太湖流域新石器时期水与文化兴衰》，《科学》1998 年第 2 期，等等。

区历史地理的研究^①，都是在这方面作出的有益努力。

K.A. 魏特夫 (K.A. Wittfogel) 博士在他 1931 年出版的名著《中国的经济与社会》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 Versuch der wissenschaftlichen Analyse einergrossen asiatischen Agrargesellschaft) 中提出了“中国经济—政治核心区”的概念，他认为“在中国处于农业国时”，这些核心区从西北到东北，到长江流域，曾有过三次变动，根据这些变动，他得出了中国文化发展三阶段论的观点^②。冀朝鼎博士于 1935 年完成的学位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③ (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as reveal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works for water-control) 则从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的形成及其转移入手，阐释了中国历史上交替出现的统一与分裂现象的经济地理基础。经济区和经济重心的概念与研究思路为中国史学界引进并继承发展^④，而将其与中国社会发展联系起来的思想方法却因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嫌疑而遭到摒弃。因此（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迄今为止，尚无系统论述地理环境及其变迁与中国历史发展之间关系的论著出现。而魏特夫与冀朝鼎博士的思想方法却给我们一个重要启发，使我们认识到：从地理的角度，由中国地理区域的多样性以及历史时期区域开发层次的巨大差异入手，探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区域特征和区域差异，将有助于加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论文集之第二部分“沙漠的历史地理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侯仁之：《我国西北风沙地区的历史地理管窥》，见所著《历史地理学四论》之附录，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9~107 页，等等。

^② 下揭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译本第 14 页下注释。

中译本由朱占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如 50 年代张家驹所著之《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以及此后的一系列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冀氏著作的影响。

深对中国历史的全面认识。

2. 区域多样性与历史发展

即使是完全非专业的普通人，在其生活经验中，也常常强烈地感受到不同区域之间在自然环境、居住人口及其居住方式、生产方式、文化形态（特别是方言和习俗）等各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异，而这些差异显然与长期以来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换言之，这些差异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法国年鉴学派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曾用抒情的笔调写到法兰西的多样性：

它的地域斑驳陆离为世所罕见，顽强地显示其令人惊叹的乡土特性，犹如一幅风景镶嵌画，其复杂多变竟是绝无仅有。远行人足迹所至……景色始终在变化。每座村庄，每个山谷，每个地区，莫不如此。……每座城市、每个区域、每个省份更各有其鲜明的特征：不仅是别具一格的自然风光，不仅是人打下的各种烙印，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习俗，一种生活方式，以及确定基本人际关系的一整套准则：父母和子女的关系，男女之间的关系，朋友之间和邻居之间的关系。

而最为重要的是，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的延续，它们“在昨天比在今天更加明显”^①。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且不说在中国辽阔的国土上较大距离的区域差异，如区际、省际差异，即便是在乡村旅行，我们也会发现，每隔二三十公里，生活方式、自然条件、聚落形态乃至人们的衣着、村庄和田野的色彩全都会发生变化。这些地域特性早已渗透在平民百姓的心坎中，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在外人看来，也许某些区域的特性不明确，或者地区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分界，然而，对于当地居民来

前揭《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第 17 页。

说，这些地区特性却是清晰地存在着的，本地区与相邻地区的边界也非常清楚。“就小型地区而言，边界概念对我们已然（变得）陌生，并且这一概念看来似乎十分牵强……可是，在乡下人的心目中，概念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毫不含糊。农夫们终日劳作在田野上，正是依据周围的景物变化，他们能够确定不同地区的分界线：例如，在小河的对岸，穿过小树林，到了山坡下方，就是另一个地区了。”^①虽然随着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进程，地区特性似乎正在逐渐消失，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每一个地区发生的变化，都有别于邻近的其他地区，或者变化的方式各具特点，从而造成了界线分明的新差异。

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地理景观（自然与人文的景观）上，还表现在区域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过程与特点方面：不同区域经济开发的进程与开发模式、生产生活方式的演进乃至政治模式、文化形态诸方面都会有很大差异。在汉代，当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文明已达到相当的高度时，长江中下游的所谓楚越之地，还是“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②，基本上处于原始农业状态。而自然条件与开发起步都比较相近的长江中游江汉——洞庭湖平原和下游的太湖平原在后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却走过了差异相当大的道路，并形成了风格迥异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就政治形态而言，中原地区较早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建立了中央集权政权，实行统一的行政区划；而在游牧民族地区，则长期盛行军事奴隶制或部落联盟，人民随季节迁移。山区和边疆地区人口稀少，居住分散，长期游离于中原王朝的统治之外。西北沙漠中的绿洲范围有限，相互间以及与外界的联系困难，所以形成“列国林立”的局面，其统治模式也

① 前揭《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第 31 页。

②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与中原王朝有很大不同^①。凡此，都是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及其具体表现的差异，我们将这种差异称为“历史发展的地区差异”。也就是说，地区多样性包含两重含义：一是景观多样性，二是历史发展道路与模式多样性。

地区景观与历史发展的多样性根源于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与地形的多样性^②，而距离和辽阔地域则是其形成发育的前提，正是由于地域的辽阔，积年累月形成的地方特性才得以保存。需要说明的是，每当我们试图讨论区域问题时，第一个印象往往认为区域是为了管理、描述或研究的方便而设定的，事实并不尽然。实际上，区域是先于统一国家的客观存在，正是在统一的过程中，村庄和集镇、集镇和城市、地区（郡、州、府）和行省，才终于被缝合成一个整体。同时，也正是因为统一国家与中央集权政治的存在和高度发展，使多样性的地区经济成为可能，并进而保证了社会与文化之地区多样性的存在。很难想像一个自给自足的寡民小国会有风采多样的地区。一定规模的商品经济是多样性的地区经济得以发育的基础，而大一统中央集权制下政府对于土地所有者的赋役关系以及对于城市和经济活动的统制政策，在客观上打破了区域间货物流通的障碍，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的较早发展，从而提供了这种基础。卢云在讨论文化区域问题时，认为自然环境、行政区划、经济类型、移民以及城市发展是影响中国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上编第一章“中国文化的历史地理环境”（葛剑雄执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9~30 页。

需要指出的是，气候是影响地区景观与历史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在 1 万年以来的人类历史时期，地形地貌相对而言比较稳定，其对于地区景观的塑造与历史发展道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地域结构的构建方面，而气候的变化，特别是突变则不仅可能彻底改变地区景观，而且还可能极大地影响历史进程，甚至改变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这一问题比较复杂，容俟以后再作讨论。

历史文化区域之生成、演变的重要导因^①，这几方面与地区景观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也同样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补充，我还注意到地方特权和方言、风俗等文化因素在多样性区域之生成与演变中的重要作用。这里的“地方特权”，主要是指地方政治与军事地位的特殊性，如京畿地区和边疆地区，就常因其特殊地位而形成独特的地理景观以及历史发展轨迹。至于方言、风俗等文化因素，则既是地区多样性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促进地区多样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②。

地区景观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构架和走向有怎样的关系？布罗代尔在《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中提出了一个看似很突兀的问题：“地理是否创造了法兰西？”这一提问是立足于法兰西客观上是一种地理存在的认识之上的。我们不妨提出一个类似的问题：地理是否创造了中国？许多人可能对这种提问方式心存反感，关键在于“创造”一词，改为“塑造”或许要好一些，但也不能尽如人意——词语的局限于此可以见出一斑。撇开这些关于词语的讨论，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地理环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制约和影响中国历史的发展？回答这一问题显然是我目前学力之所不能及，我也无意于进行几近于文字游戏的单纯的理论探讨，这里只是提出一种思考的方式，即从地理的角度，认识中国封建社会（暂时沿用这一提法）长期延续性的问题。

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与中国古史分期，特别是奴

^① 卢云：《文化区：中国历史发展的空间透视》，《历史地理》第 9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谭其骧：《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历史地理》第 10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与地区差异》，《复旦学报》1986 年第 2 期；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周振鹤等：《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等等。

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的时限如何划分有关。西周封建说（一般认为始于公元前 12 世纪）中封建社会为时最长，下至鸦片战争，共达 3000 年之久；春秋战国之际（一般认为始于公元前 5 世纪）封建说，有 2400 多年；魏晋封建说也有 1700 多年。而西欧各国的封建社会一般是始于公元 5 世纪，结束于十七八世纪；沙俄则始于 9 世纪，结束于 19 世纪；日本也大致始于 9 世纪，结束于 19 世纪末期。对比之下，中国最短的魏晋说也要比欧洲和日本长几百年，其他二说则长到超过 1000 年。所以，对比欧洲与日本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确是长期的。因为长期，自然而然的也就有停滞之说。表面看来，这在逻辑上是顺理成章的。但如果我们仔细地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从宏观上看，经济是否还有发展？生产关系是否已经基本上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之不能继续上升？我们注意到，黄河中下游地区大约从唐代中后期开始，之后的一千多年间，大致可以说是已趋停滞。但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江南以及闽、广与云贵各省，却都不然。正是在封建社会后期，这些地区经济上才有较显著的发展。只是到 18 世纪中后期，也就是乾隆中期以后，才看出南方经济也已趋于停滞。因此，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之说，看来最多只能符合黄河中下游的情况，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显然不是如此。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各有特点，其发展状况也很不平衡。少数民族地区自不待言，汉族定居地，南北之间在历史时期也很不相同。因此，不宜简单地谈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性，而应区别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特别是从南宋以后，全国经济重心已经南移，就更不宜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为代表，作为衡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尺度。这一认识反过来又促使我们从地理的角度来思考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从地理的角度，我们注意到，中国地域广大，也是原因之一。正由于中国地域广大，所以当中心地带的封建生产关系发

展到了顶点、已成为束缚生产力的因素之后，人们就可以到其他地区寻找发展的机会，封建生产关系也就因之而转移到一个新的地区，在这个新的地区，封建生产关系往往还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不仅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还能起到促进作用，从而表现出某种生命力。中国封建社会经济中心不断迁移的过程，也就是封建的生产关系的重心不断迁移的过程；同样，边疆地区、山区的不断开发，也是封建的生产关系不断扩展的过程。此其一。其二，由于中国地域广大，不同的地区的封建生产关系也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形态是多种多样的。生产关系的多样性给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提供了更大的选择余地，当一种生产关系形态已表现出僵化、落后时，就可以选择另一种形态。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自身的包容性与自我调节机制与中国的地理状况有很大的关系^①。

二 主要人地关系学说之检讨

欲深入考察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就不能不涉及到各种各样的人地关系学说。

人地关系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引人注目的跨学科问题，很多学科从不同的学科背景、不同的层次和尺度上探究人地关系的不同侧面。概言之，以哲学、历史学为主体的人文科学主要是从哲学、历史观及伦理层次展开理论思辨与逻辑论证，具有浓厚的主

这一问题的研究思路最初是由业师石泉先生在 80 年代初提出的，惜未能作较系统的阐述，仅有一些零星的片段，请参阅石泉：《我的治学道路与方法》，见《史学家自述——我的史学观》第 81~82 页，以及石师编写的《中国历史地理专题讲义》（油印本），武汉大学历史系，1981 年。本节所作的阐述或许距石师原意已远，当然由笔者负责。

观和直觉色彩；而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等与这一问题有密切关系的自然科学，则主要通过具体个案的分析，在实证研究层次上加以归纳、概括，所得出的常常是能够实证和实验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上升到哲学高度。两方面的研究互为前提，互相影响，也常常互相辩诘，相互补充。但也正因为此，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常是在不同层次上、使用不同的学科语言和思维方式进行的，不免出现不同程度的矛盾混乱与“各说各话”的现象。本节之主旨即在辨析不同学科背景下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思路，检讨其得失^①。

1. 地理环境决定论

古典时期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主要关注的是地理环境对人的体格、气质和精神的影响。古希腊时代，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认为人类特性产生于气候，气候和季节变换可以影响人类的肉体 and 心灵；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色诺芬等人在重视气候影响的同时，也强调地区的水平和垂直构造及土质肥瘠对于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影响^②。柏拉图（Platon）则认为人类精神生活与海洋密切相关^③。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第一个将地理环境与政治制度联系起来，认为地理位置、气候、土壤等影响个别民族特征与社会性质。希腊半岛处于炎热与寒冷气候之间，而赋

本节主要讨论与历史观和历史地理研究有密切关系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人地相关论以及“或然论”等人地关系学说，而对于与此关系不大的或者未进入科学研究领域的人定胜天论、天人合一论、人地和谐论以及近年来比较流行的生态中心主义等学说则未予讨论。

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王兰生译），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20~21 页。

^③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第 10 卷，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419~423 页。

予希腊人以优良品性，并组织起良好的政府^①。16 世纪初期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琼·博丁（Jean Bodin）在他的著作《论共和国》中探索了行星对于地球上居民的影响，认为住在世界南方的人受土星的影响，过着宗教修心的生活；住在北方的人受到火星的影响，变得好战，善于运用机械装置；住在中部的人受到木星的影响，能够在法律的统治下过文明的生活方式。不同类型的人需要不同形式的政府^②。

近代地理决定论思潮盛行于 18 世纪，由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率先提出，被称为社会学中的地理派或历史的地理史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将亚里士多德的论证扩展到不同气候的特殊性对各民族生理、心理、气质、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他把地理环境的作用归纳为三种关系：自然条件与人的生理特征的关系，自然条件与人的心理特征的关系，自然条件与法律和国家政体的关系。认为“气候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热带地方通常为专制主义笼罩，温带形成强盛与自由的民族^③。他认为：“阿提卡土壤贫瘠，因而建立了平民政治；拉栖代孟的土壤肥沃，因而建立了贵族政治。”“如果从自然特质来说，小国宜于共和政体，中等国宜于君主治理，大帝国宜于由专制君主治理的话，要维持原有政体的原则，就应该维持原有的疆域，疆域的缩小或扩张都会变更国家的精神。”^④黑格尔将地理环境看做精神的舞台，是历史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 7 卷第 7 节，见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 9 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43~245 页。

前揭《地理学思想史》，第 131 页。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 3 卷第 14~18 章，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第 227~303 页。

前揭《论法的精神》第 1 卷第 8 章第 20 节，第 126~127 页。

的“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不同的环境会有不同的历史进程^①。英国历史学家巴克爾（Buckle）的历史学基本框架是：地理、气候条件影响人的生理，生理差异导致人的不同精神和气质，从而有不同的历史进程^②。

近代地理学的创始人洪堡（Humboldt）和李特尔（Ritter）都是不同程度上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者，李特尔关于地理环境决定人类的空间分布和人类活动方式的理论成为 19 世纪地理学的主流^③。第一个系统地把决定论引入地理学的是拉采尔（F. Ratzel），他在《人类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ie*）一书中运用达尔文生物学观念研究人类社会，认为地理环境从多方面控制人类，对人类生理机能、心理状态、社会组织和经济发达状况均有影响，并决定着人类迁移和分布。因而地理环境野蛮地、盲目地支配着人类命运^④。这种控制论思潮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成为欧美地理学的理论基石。在德国地理学界，宣扬并推荐这一理论的有赫特纳、魏格纳、施吕特尔等^⑤。而“世界各国的近代地理学基本上都是受着在德国发展起来的近代地理学的影响

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上册，三联书店 1978 年版。

② 巴克爾：《英国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 Longman 1972 edition, London.）；另请参阅索美尔（Bernard Semmel）：《巴克爾：自由信仰和历史科学》（H. F. Buckle: *The Liberal Faith and the Science of History*），见《英国社会学杂志》第 27 卷，第 367~381 页。

前揭《地理学思想史》第 6 章，第 143~167 页；前揭《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第 1 编第 5 章第 1 节，第 89~106 页。

④ 李旭旦主编：《人文地理学论丛》，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10 页；前揭《地理学思想史》第 8 章，第 210~214 页；理查德·哈特向：《地理学的性质》，叶光庭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89~91 页。

⑤ 前揭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第 4 编第 4 章，第 278~301 页；前揭《地理学思想史》第 8 章，第 214~223 页；前揭《地理学的性质》第 2 章，第 101~104 页。

的’^①。拉采尔的学生森普尔 (Ellen C. Semple) 将这一思潮传到了美国, 在《美国历史与地理环境》 (American History and Its Geographic Conditions)、《地理环境的影响》 (Influences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 等书中一再加以发挥。^② 美国地理学家 E. 亨丁顿 (E. Huntington) 于 1903~1906 年在印度北部、中国塔里木盆地等地考察后发表的《亚洲的脉动》 (The Pulse of Asia) 一书, 认为 13 世纪蒙古人大规模向外扩张是由于居住地气候变干和牧场条件日益变坏所致。1915 年他又出版了《文明与气候》 (Civilization and Climate), 创立了人类文化只能在具有刺激性气候的地区才能发展的假说, 并认为热带气候单调, 居民生活将永远陷入贫困^③。

近代地理环境论自它产生始, 就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 因为人类社会历史的许多事实, 的确是它所无法解释的。许多学者承认, 环境因素必不可少, 但不足以解释历史的变革。更为重要的是, 地理环境决定论引起了一些逻辑上的混乱, 其中最严重的在于: 由于环境决定论者在从事研究之先, 对问题已持有一种总的看法, 而没有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 所以, 其研究没有任何科学的客观性。人类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已有数千年之久, 事实上, 原因与结果乃是相互纠缠和渗透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是将世界简单化了的狭隘观点, 今天看来, 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当时,

^① 前揭《地理学的性质》第 130 页。

前揭《地理学思想史》第 356~359 页。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中, 森普尔概括地谈到她的研究方法说: “作者自己的研究方法, 是比较各个种族间和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中, 生活在同一地理环境下的典型民族。如果这些生活在相同环境下的不同种族的民族, 具有相似或相关的社会、经济或历史的发展, 那末就可以合理地说明这种相似性是由于环境, 而不是由于种族造成的。这样, 通过全面的比较, 在这些问题上, 当说明某些大型的社会和历史现象时, 种族因素就在两个未知数中被排除了。”转引自前揭《地理学思想史》第 357 页。

前揭《地理学思想史》第 352~354 页。

环境决定论却拥有许多得力的辩护者。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环境决定论才在西方学术界中衰落^①。

2. 人地相关论

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经典作家中较早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地理环境论，他从地理环境影响社会历史的具体方式角度出发，强调“自然界对社会生产力状况，并且通过生产力状况对人类的全部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的整个思想上层建筑产生影响”^②。并进一步指出：“地理环境对于社会人类的影响，是一种可变的量。被地理环境的特征所决定的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人类控制自然的权力，因而使人类对于周围的地理环境发生了一种新的关系。”^③这些阐释较之地理环境决定论显然前进了一大步。但由于它主要是由普列汉诺夫来完成的，所以在很长的时间内遭到批判。1938年，斯大林在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时指出：“地理环境无疑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和必要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但是它的影响并不是决定的影响。”“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原因、决定的原因。”这个论断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组成部分。但是，仔细品味斯大林的这个论断，却不免觉得简单而模糊，“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和必要的条件”是什么意思？地理环境怎样对人类社会起作用？“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与“决

^① K. 哈瑞斯：《对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几点看法》（唐晓峰译），见《历史地理》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普列汉诺夫：《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484~585页。

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见前揭《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70~171页。